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书刊评论】	《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 发生问题的讨论	徐海亮
【史实辨析】	重庆武斗的真相与文革认知的五大误区	谌旭彬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二）	王复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书刊评论】

《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

• 徐海亮 •

今年元旦期间，正好去了深圳，戚回忆录书稿的编辑、出版商敖本立叫我读读将要出书的修改稿，提点意见，也约请正在香港休元旦假的余汝信过来看稿。他拿出有“武汉720事件”和“军队与文革”这两章。我们先睹为快，就在他那里分别翻阅，再交换文本。

余汝信应该是相当熟悉军队与文革这部分内容的，而且他在他自己的文稿里，前一年也刚刚起草了有关武汉“720事件”这一章，与我交流过。读后，他认为这两章写的很不理想，好像没有发挥出戚应该有的（人们过去印象中的）水平来；我认为书稿中关于“720”这一章，事件的起因和实质，好像还没有点到要害，重点放在去追究王力个人责任了。我们认为这样恐怕会砸了戚本禹的“牌子”。我们把感觉告诉敖本立。午餐后余汝信即返港了，我留了下来，敖先生把业已打印出的书稿中的文革部分让我继续阅读。我又阅读了一天。次日下午，敖先生驱车大鹏湾，去看望住在乡村别墅的戚本禹，我得以同行。尽管戚面带病容（听说腹部不适，人也消瘦了，敖怀疑有绝症），但讲到书稿问题便提起精神来，认真听我们谈对修改稿的印象和意见。

我委婉地告诉他余汝信和我的感觉。我说读了文革部分，觉得书稿中其他部分，大致属于他亲历的一些重大事件和接触的人物部分，写的较为流畅，能把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主要大事串起来了，有些我们不清楚内情，有参考和资讯作用；但如武汉事件这种他不在现场的历史过程，效果就要差一些。我觉得好像他尚未把现已披露的史实和事件本质融汇表达出来，而且这两章文字风格也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似乎不像我们熟悉的他过去发表的文字。他倒承认这两章主要是身边的其他年轻的热心者帮他整理的口述和讨论，我感到那么可能是参考综合了别人的回忆，并非他亲历所见。他肯定，已把我们考证的事件主要史实说清了，但我觉得修改稿这一章过分地追究王力的罪责，而戚对王力的反感，大多是该事件前后的，出自个人的看法，更主要是来自于事件之后——特别是文革之后王力媚邓批毛的表现。第一节原来的标题好像就有“王力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出发点是讲王力的问题。

而实际过程是：有没有王力，只要周恩来拿出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原则来，在陈再道支持下的独立师都会坚决抵制的。独立师领导挑动战士和群众抗拒的，决非什么王力讲了什么话，而恰恰是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这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到事件时，几乎都回避或认识模糊的实质问题，乃至许多对文革研究有成效者，也被王力个人举止搅浑了视线，以致判断出现原则性偏移。

我说如果这一章没有抓住要害，而如文革中和文革后把王力打成“坏人”那样，人云亦云，那就失去了史学研究价值，掉了牌子。我的意见尖锐，没有顾忌作者的感受，不过戚本禹倒是爽快地答应需要修改。只是在我们告别时撂下一句话：“没有想到你对王力的看法还这么好啊”！看来没有真想通。我只有回答“这是在写武汉事件历史，不是写王力个人嘛”。

现在回忆录全书已经出版，关于“720事件”，作者确实已作了相当程度的修改，原来直接指责王力的小标题也已去掉，加上了“武汉军区的阻抗”，而且在第一小节后面加上一段很关键的话：“但无论是主席或中央文革都不认为王力是‘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七二〇事件’的主导因素仍然是武汉军区对中央处理武汉文革运动方针的反抗。王力的讲话不过是个导火线，没这个讲话，武汉的文革运动照样会爆发大冲突”。（本书650页）

为了全面探索该事件，我在2007年第一次访问戚本禹，提的首要问题就是“720事件”前中央高层的有关决策究竟是什么。该回忆录第25章第一小节第一自然段简单叙述了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提出南巡武汉，在汪东兴随主席南下之时，由戚任中办代主任。对比2007年戚亲口回答，我觉得不论是2007年，还是这里书面的叙述，都过于简单。特别毛泽东对形势和任务有什么交代，没有提到。这一点，研究者多从杨成武的回忆里参考。而中央是否对武汉问题有一个研讨和共识？没有明确提到。戚当时回答我13号下午的会议，就没有讨论武汉的问题，而且中央文革在此前，也从未正式讨论过武汉的问题。这点很重要，对于了解事件前的大背景确实很有作用。戚本禹和杨成武仅仅是在6月下旬武汉暴力冲突升级时，商量给军区一个立即制止暴力的电话，仅就暴力冲突升级问题交换了意见；对照王力和其他人亲历者的回忆，确实如此。而主席试图坐镇武汉，对指导全国运动有所作为，且在会上提出戚代理中办主任，是已有考虑的。但参加这天会议的最后生在者戚本禹和汪东兴都已故去，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会前的6、7号、9号就文革重大问题、武汉问题、军队问题做过什么交谈、研究，暂无新材料予以证实。惟有主席在12号和挚友周世钊交谈长沙运动〔陈明新，《领袖情——毛泽东与周世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周彦瑜、吴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4号专列路过郑州，曾就当地两派的对立冲突，已经提出过群众组织问题，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重要概念。这对于毛泽东解决武汉问题的基本倾向是有参考意义的。

戚本禹在这里根据后来的资讯，特别是他后来整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认为“不是支持一派去压倒另一派了。这实际上是个战略实现的大转变”（本书666页），回忆道：主席“想继续推广上海模式，解决武汉‘百万雄师’的问题，不过他在思路上有所调整，不是打算让造反派一统天下，而是希望在避免武斗的情况下实行两派大联合”。（本书，648页）进而，戚分析：主席“不是简单地把‘百万雄师’扶上来或打下去……主席是想以军队为主来搞两派的大联合，这个方案与年初解决上海一月革命的方案有所不同。”“王力对主席解决武汉对立两派群众组织问题的方法与思路的变化没有理解”（648页）“毛主席下那么大决心打倒王力、关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新的战略思想”（666页）。现在看，从毛泽东到武汉前后的讲话，直至“720事件”发生，毛泽东的策略确实已经发生一些变

化，戚本禹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最高层实际情况的。而这一点，并非武汉地区的军队领导和各派群众都心领神会，甚至至今缺乏理性认识的。诚然，这里戚的表述也过于简单化。

不过戚本禹接着在下面分析谢富治和王力7月14日晚见过主席就“先去大学造反派中发表讲话，对造反派表示支持”。“他们很可能是看到张春桥在上海签字承认工人造反派以后，中央文革发了几个电报，就把那里的‘赤卫队’搞垮了。所以他以为他在武汉也可以这样把问题解决”（648—649页）。这一段分析带有较大的主观推测，谢、王回京后并未这样对文革小组和戚本人这么去说，也流于事后那种泛泛的对谢、王的指责。因为毛、周都刚到武汉，周恩来并未指令要谢、王解决问题，他们还不致于狂妄到这一步——要主动去按自己理解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们当晚去湖北大学，初衷也就是去看看大字报，从现场接触的记载看，也不存在他们对造反派表示了什么支持，周恩来事后也是从积极方面来看待的——“倒可以掩护主席”。在15日毛泽东与谢、王谈话后，他们当晚去了华中工学院，与“新华工”造反学生对话，17日，去了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二司司令部，和那里的二司、三司学生对话，从当时造反派小报及时刊载的谈话内容看，谢、王两人讲话的主题，都是要求停止武斗，坐下来学习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正处》，正确对待不同派别和认识，团结大多数。整个讲话是批评和引导造反学生群众的。今天心平气和地说，谢、王去湖北大学、华工和测绘学院，公开讲话没有超出或违反毛、周处理武汉问题的原则精神，而且主要内容就是批评和引导造反派的。到现在来看，这些意见本身仍然符合毛、周当时旨意的，也是正确的。

不过本书阙失了一个重要史实，即16日晚谢、王去“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和保守派的头头接触，气氛很不好，王力严肃地也是不耐烦地批评了保守派集聚据点搞武斗，但“百万雄师”头头没有接受，谢、王没有意识到与“百万雄师”接触的重要性，也失去了一个与他们交心谈心，了解他们和做思想工作的机会。我访问“百万雄师”头头时，他认为如果谢王不是那种态度，后来事态不致于发展成那样严重。见面后，他们对于和中央文革交流、反映要求，彻底失望。

周总理召开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做工作，本书交代过于简练，没有让后人知晓其实从15日到18日，军区领导一直抵触，没有接受总理的批评意见，戚概括了18日总理的三条原则性意见，其实，这里仅仅是根据王力的一些回忆转述的，而且戚没有展开他说的记录中总理总共讲的八点意见。周总理18日在军区的讲话原则，是武汉事件发生时肇事人最为抵触，执意要追究的问题，本书没有引述和展开，是十分遗憾的事情。戚本禹并不知道，直接肇事人直到1978年为该事件平反后，还对周恩来解决武汉问题耿耿于怀。

周恩来在军区师级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是这样讲的：

“我们有几个建议：第一、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支左的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中央建议陈再道和钟汉华进行自我批评。出图片，是严重打击，压制了群众，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第二、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第三、凡是群众组织都不能取缔、解散、就是保守组织也不能解散，要教育争取。你们解散工总可能受我指名的影响。第四、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工总起来可能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帮助来作。第五、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第六、军区要作农民的工作，不要进城来参加武斗。第七、军区要承担责任以外，要作部队教育工作，教育下属单位支持造反派。长期的影响，不作这工作是不行的。第八、所有群众组织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改变对解放军的看法，行为要澄清。”（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

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引用，37—4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而笔者2016年元旦期间询问过作者，是否全部看过和记住涉及“720事件”一些重要对话、讲话的资料，阅读过我出版的实录文集，戚说全部看过，也采用了。实际上他没有参考和采用这些重要资料中最关键的内容，似乎也没有理顺事件发生、发展的主要脉络。

所以在本书649页，讲述谢、王受“总理讲话的鼓舞”，到武汉水院与二司总部在场学生见面，接着到水院体育馆对数千学生、工人发表讲话，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打倒“武老谭”的口号响彻全场。这一系列记载，似是而非。他们如何受总理的鼓舞？纯属作者臆测。所谓打倒口号响彻全场，也很不准确。当晚在体育馆现场，绝大多数发自群众的口号都还是正面的情理之中的，笔者直接的感受，谢、王依然是与在华工、测绘学院一样，批评了造反派当时的一些“左”的倾向和错误，要求首先停止武斗，要坐下来学习，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正确对待解放军。即周八点意见的第8点。当然，王力在说到武汉问题可以解决得好，特别强调了“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笔者当时的感觉：王力怎么这么像个知识分子，太激情了。他还说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不允许他存在了，这大概就是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吧。但也没有超出周八点意见中的1、2、3点范围。（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水院讲话，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46—5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作者接着就记述谢、王讲话录音在全市播放，“这引起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649页）这里，首先弄混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谢、王在水院讲话，是19日凌晨，此录音播放，在19日上午。总理讲话，按军区规定再三交待是暂不向下传达，而独立师政委早在18日晚就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请示传达总理18日下午在军区的讲话，获得钟允许后，当夜独立师就将总理原则讲话精神传达到师部机关领导和团级干部（师常委会原决定19日传达），次日传达到排级干部及以下，并将在各处支左指战员召回，扩大到基层，19日上午已经扩散到战士。独立师后来整训揭发，师政委蓄意加快传达进程，也加大了传达范围，故意点火煽动指战员情绪。19日下午已有独立师战士到军区造反，要求澄清是否中央有这个传说的“四点指示”。实际上，在19日全天，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并未就街上播放的谢、王讲话闹事，而是独立师煽动部分指战员，假以“王力‘四点指示’”名义，散布似是而非的、所谓总理谈话原则（当时流传的内容大致与周恩来八点意见的前4点接近）。甚至独立师蔡政委专门要求肇事人员在外面不要讲是周恩来说的，说成是王力讲的，假以王力充靶子，意在公开怀疑、抵制中央精神。这是多数议论事件的人乃至研究者始终不愿讲明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的主流舆论、文字，总是说王力挑动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弹。而王力的主要问题，是19号下午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时，居高临下，傲慢地教训这些军队领导，激起不满。独立师领导决定造反与这次讲话大有关系。这点戚回忆录讲到了点上。

独立师是始作俑者，率先开出宣传车上街的当事人之一朱学诗回忆（参阅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网络“朱老总朱老总朱老总的博客”发表），19日晚餐时演出队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

‘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遂写下“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周恩来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众人情绪失控，宣传车呼啸上街了。可见起事的当事人并非针对王力个人。而且当时肇事的独立师指战员和一些“百万雄师”群众，怀疑、斥责的对象，针对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和整个中央文革，实质是针对中共

中央。较为典型的是：支左办公室卫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是没法否认和回避的严峻事实。作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在整个回忆录中都特别维护了文革小组整体和文革初期的基本路线，维护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作为，但对于发生在他权倾一时之际的武汉事件，却回避不谈武汉军区主官陈再道上将当面顶撞周恩来讲，不谈军区政委同意独立师破格地传达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加速挑起部队反弹，不谈当时军民对中央精神的反弹决非旨在炮打王力和谢富治——而是指向中央。从而避开了问题实质，把注意力引向王力个人。史学研究首先要寻求“有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并非作者治史的缺陷，而是带有一种淡化事件价值判断和政治性质的有意之为。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询问他有关武汉的问题，他说在与杨成武起草“6·26电话”通知之前，文革小组从来没有正式研讨过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但他个人从所知信息看，还倾向于军区一些（杨成武倒不是），我询问为什么，他说他妹妹是部队家属（上海空四军的家属），他听到军队方面来的消息多。我当时以为他是有意表示——自己与“反军”的极左思潮没有关联，而坊间的流传、文革中后期的批判，多将戚与反军极左联系起来。

记得笔者与戚第一次谈到事件的深刻背景，谈到事件是否有大背景，他说当时确实认为有黑手操纵促使，仓促中也追查了，但没有查出来；因为运动中心很快就转向其他问题，接着又反过来追查王力、关锋了。不过，中央军委当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举办了军队干部的学习班，在湖北班上，军区原来主要领导同志对事件的发生做了揭发和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口头和书面检查，一些内幕也已披露，戚本禹对此好像没有印象。在9月之后，流传出王力导致事件爆发，是罪魁祸首，人云亦云，也影响了1967年不在武汉现场的戚本禹，后来他也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全部史实。况且他在本事件前后、文革之后对王力个人举止言行有很不好的看法，以致在记载历史中显示出来带倾向的情绪。这个原则问题，笔者在大鹏湾与作者一再说明，但现书基本按原稿的思路处理，没有做出主要的修改。或许作者想维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与声誉，维持中央对于王力的清查批判，故意不去讲武汉事件是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一种反动？这一点文革研究中的自由派右翼为了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倒是非常关注，公开表明的。

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的态度是很有说明意义的。7月25日声援武汉的大会之后，周恩来接见河南省军队干部时，谈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

〔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26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周恩来一开始就指出该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周恩来当年的这些概括是完全准确的。

诚然，选择和采用史料是作者个人的权利。对于“720事件”发生的这一段叙述，作者生活到了当代，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问题，但他没有如一位学者或史官那样专注细节、归纳纷繁，他没有超出毛、周对事件当年的判断、评价和处理来做历史分析，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即便是知道了更多细节或事件背后的隐秘，在1967年7、8月也只能做出那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他们毕竟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而且戚本禹对于武汉事件的研讨，也没有超出毛、周去世以后中共高层重新评价与否定文革（毛、周处理的武汉事件则首当其冲）的基本评估，尽管他主观上是要坚持文革理念和路线。看来，对作者过高

的纯史学要求是不实际的，戚本禹在中枢机关工作多年，文革中更是一度处于特殊位置，他在武汉事件问题上，也只能和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主要从政治或政治学上来看问题了。这里，他看重宏观的政治判断，而非微观的史实辨别。

戚本禹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因为他坚持拥戴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的文革，作者本人受到两种极为对立的政治评价：或者是对全书史学价值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全盘否定，或者是对戚本禹忠于毛泽东思想和事业的全面肯定。而戚本禹本来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文革人物，毕竟还不是史学的圣人或政治的恶魔，在对“720事件”发生的具体认识与评述上，他可能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是难以全面概括的。

2016年11月25日

□ 原载“红色中国”网

~~~~~

### 【史实辨析】

## 重庆武斗的真相与文革认知的五大误区

• 谌旭彬 •

### ◇ 武斗的历史，还相当混沌

文革武斗，今人批评虽多，但长期缺乏深入的专业研究，试以重庆红卫兵墓园之往事言之：

#### 1、墓园内埋葬的大多数是工人，“红卫兵墓园”的名称并不恰当

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645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

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 2、大规模武斗，与造反派内部分裂、争权有极大的关系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1966年）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中等校学生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8月26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1966年8月的重庆出现。8月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6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8月26日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

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1967年1月6日，晚，沙坪坝区12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1967年1月24—26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2月8日，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 3、动枪动炮动坦克的背后，有高层的鼓动和支持

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1967年7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5月开始的，“5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6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7月8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7月25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8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7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7月20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〇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〇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



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8月9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1967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10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2778支，子弹11万多发，炮109门，手榴弹9831枚，各种机动车辆67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

◇ 不仅仅是武斗的历史一片混沌，对整个文革的认知，也常常误入歧途

在今天的主流语境里，“文革”已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是一场必须被彻底否定的历史浩劫。但遗憾的是，因为对历史真相认知的不完整，今人对文革的认知常常误入歧途。试举几例：

#### 1、错把什么都归罪于造反派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而文革中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不为普通民众所了解。于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抢的罪恶都笼而统之地全部归罪于造反派了。举个例子，《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3辑》收录有一篇《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传略》。据该文介绍：“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下，郑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诬为‘黑帮’，被扣上‘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和庇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罪名，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在他点名批判的四十天中，他始终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离关押三天时间，遭到无情的折磨摧残，1966年8月2日被迫害致死。”

按这段描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死于“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众所周知，林彪、江青当时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郑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吗？并不是，恰恰相反，周家瑜等人组织造反派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愤恨于郑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郑思群的其实是重庆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组，工作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对象。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随意套个“造反派”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 2、错把文革“大民主”当作“民主”

将“文革”视作“大民主”，可谓时下的“文革”怀念者们的共同认知。这一认知有一个特殊的出发点，即“文革”前夕官民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经济层面，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有很大关系；政治层面，与历次运动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关系。“文革”来了之后，许多民众得以通过随意的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等手段，将其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发泄出来。这种自由，确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

但这种“大民主”绝非什么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这种“自由”是单向度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运动中“自由”地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其结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实的案例可查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极大的“禁锢”，与“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二，“大民主”虽然确实给了民众某些自由和权利，但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同时也必须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1966年，造反派们被赋予“大民主”的资格，1968年造反派被镇压，该资格又被收回；可见“大民主”的有无，全赖高度集权的权威的个人好恶。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这些自由和权利本应由民选的权力机构和民主制定的法律来赋予，也应在这个民选权力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运行。

何况，即便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泽东，也从未将“大民主”视作自己固定的价值观。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就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狠批过“大民主”：“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还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

## 3、错把文革当作“多数人的暴政”

与“文革”的怀念者们不同，时下“文革”的批评者尤其喜欢用“多数人的暴政”来形容“文革”，且将其视作“文革”的实质。“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提出来的，意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宾派专政。

但文革却绝不是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原因相当简单：文革实际上更近似于一场提线木偶戏。所有取得胜利的群众运动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数百万强大的军队在背后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文革期间所谓的“多数人”，根本无力对任何其他群体实施“暴政”。在转型时代，“多数人的暴政”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发生的现象，但将文革视作“多数人的暴政”，却显然误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它从发动伊始，就承载着高层明

确的政治目的，一直到运动结束，它也从未真正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它自己尚且是提线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数人的暴政”？

从一位当年的武斗参与者对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时的心境的回忆中，不难体会这些“施暴者”的“提线木偶”性质：“两派武斗，双方都有枪，我们这边是县武装部发枪，枪更多，还有炮。打起来以后，对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败退了，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们打了胜仗，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倒是吓坏了。毕竟开枪的多是中学校生，不知怎么办。面对倒下的人和鲜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不知所措。这怎么交待？既有政治上的责任，又有良心上的东西。像是在恶梦里。这时，有一个干部，成年人，出来讲话，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他说，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大家的情绪这才转过来，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那么怎么打都可以，而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问题解决了。人的心理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要求。只要这一条界限越过了，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庆功大会，大造舆论。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战争中每次大的战斗之后，都要开大会，庆功授奖，军事统帅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解决士兵打死人以后的心理负担。”（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群中学校生，实体武器是县武装部发的，思想武器是成年干部灌输的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是傀儡又是什么呢？

#### 4、错把文革与西方同时期的青年造反运动相提并论

1967年、1968年，文革风起云涌时，西方青年的左翼运动也搞得风生水起。这种同期性，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文革的造反运动与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运动本质上相同或者相似——其实，这种认知在文革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运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将其视作中国“输出革命”的成果。

这种认知可谓彻底的南辕北辙。第一，西方的造反运动，是社会内在自发酝酿的，完全不同于文革是上面煽动起来的。第二，即便这些西方造反运动在形式上乃至经济上对中国有所依赖，但在具体的诉求上，却与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别。以法国学生1968年造反的“五月风暴”为例，其基本诉求是警察退出校园，大学应该精神和思想独立。后来学生与警察爆发武力冲突，工人加入进来，其诉求也很理性：1、支持学生，警察退出校园；2、结束失业，增加工资。而中国的造反派，当时呼喊的口号却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并无现代公民意识在其中。

#### 5、错把知识分子和老干部当作文革受害者的主体

不论是文革的怀念者，还是文革的批判者，这两个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通老百姓没受什么太多伤害。确实，文革结束后，在各种场合发声控诉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长期成为媒体上以亲身经历控诉文革罪恶的主体，确实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们。

但事实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声都忙不及，自然也顾不上为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发沉默，恍若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县大屠杀等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即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数目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武斗也是如此，一

开始造反派确实主要针对保皇派，保皇派里确有不少老干部及其子弟，但保皇派被镇压下去之后，武斗在在造反派内部发展到高潮，死伤最多的，其实还是普通百姓，一如重庆红卫兵墓园内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

◇ 结语

一切历史包袱的和解，都必须建基于真相的披露。

□ 原载“腾讯历史”网

~~~~~

【拒绝遗忘】

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录（选载之二）

• 王复兴 •

第二章、1966年：文革爆发

1、考入北大，半工半读，风暴逼近

1965年夏季，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在学校本部燕园上课仅有一个学期五个月。第一个学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授课教师是教世界史的魏杞文，他经常在课余与我们一块打篮球并多次组织我们全班在晚自习时间做学术讨论或介绍世界史的经典名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是规定每人写一篇论文：论古罗马斯巴达克奴隶起义的历史意义。考试卷不评分，也无评语。我只在课下听魏老师说，王渊涛同学写的不错。

第二学期一开学，系领导就宣布：历史系开展文科教育革命试点，下乡半工半读，全系搬到北京昌平十三陵山区军都山下的林场太平庄。只有五年级暂时不下去，留在校本部写毕业论文（五年级下去仅迟了一个多月）。据查，历史系教改、搬家的背景是：1964年11月高教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主席对毛远新痛斥了现行教育制度，“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我在上高三、大一时曾二次听传达、学习此“纪要”。1965年12月底，北大教务长崔雄昆在校务会议上传达中央文件，主要精神是大学文科应半工半读、教学改革。并强调彭真同志要求：“各校尽快行动，先试点。”

于是在1966年1月，我们历史系一、二年级全体学生便打点行装，搬到了座落在山坡上的太平庄林场。当时三、四年级学生都不在学校，在农村搞四清。四年级同学不久也陆续来到太平庄，只有三年级还留在四清一线没来。到了太平庄后，我们一年级近60个男生都住在一个大礼堂，住上下铺（上下床）。冬天全屋生一个大火炉。记得每天天不亮，我就学雷锋，给大铁炉掏炉灰、加煤块。南方同学不懂怎么弄。2月1日，举办了开学典礼。来了几位北京市委和学校领导，有北京市委文委书记邓拓、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校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记得邓拓是即兴讲话，与其他人不同，没念稿，他说“来到你们这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延安抗大。”还说“我以前在这一带山区打过游击。”“同学们在这里要准备艰苦奋斗。”彭佩云在北太平庄历史系蹲点领导教育革命和史学批判，彭的秘书是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任宁芬，任宁芬同时给我们上政治课，讲授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事后一看，开学典礼那天，文革首批受冲击的对象基本到齐了。莫非他们感觉到什么，都来到太平庄亮相，争取主动，或是相互通气来

了？反正觉得这事挺怪的。但肯定的是，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都在紧跟伟大领袖，够左的了，但他们谁也没闹明白伟大领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当时我们班同学都觉得能亲身首批参加大学文科教育革命很难得，热情很高。只有个别从农村来的同学如朱祖雄，反而怨言挺多，整天骂骂咧咧，觉得被打回了原形，好不容易进京上了名牌大学，又回了农村。

在太平庄的教育革命，就是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教师们谁有授课任务就来太平庄住一阵，教学任务完了就回了燕园。我们劳动任务主要是修建宿舍、教室。有的年青教师要求革命化，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英语老师郑培蒂就来到太平庄住，每天下午和我们班同学一块劳动。她的同系男友许世敏在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后坚决要求去边疆，去了西藏部队工作。

在晚间的政治学习中，系党总支号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要自觉地与家庭划清界线，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做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天晚上，曾召开全系学生参加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生活学活用毛着、自我改造思想的大会。这是历史系在十三陵山区半工半读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这样的自觉改造思想的全系大会。在全系学生大会上，这个学生批判了自己的家庭，批判了他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揭露了亲生父母的隐私，并痛加批判。当时校、系两级党的领导（北大党委副书记彭佩云在历史系蹲点领导），为什么要引导学生当众揭露家庭隐私，通过这种荒唐的方式来引导年轻人搞什么思想革命，背叛家庭呢？党的领导应是认为：只有这样敢于当众揭露个人隐私，思想才够痛苦，才能脱胎换骨得到改造吧？这种让人作践自己，丧失尊严，从而驯服地服从党的领导的做法，是种扭曲人性，伤害当事人，侵害人权的行为。

以上关于历史系一位学生通过揭批父母隐私来自我思想革命一事，最初原稿写了这位同学的名字，也写了隐私的具体情况，但后来校友高峰看了原稿后，强烈要求笔者为避免伤害这位同学，应隐去姓名，不提具体情况。笔者认为言之有理，为此把原文作了改动，形成以上文字。此后，笔者与高峰就此事通过微信就其意义作了以下讨论：

高峰来信：“写此事的意义在于揭露毛时代对人的洗脑，目的是在政治上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整个社会。当时的“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实际上是对人性进行扭曲的洗脑，诱导或逼迫人们作践自己，用以对党表忠心。于是，有的同学就用暴露个人隐私来自我批判。这是毛和共产党历来采用的一种洗脑方法，整人方法，泯灭人性地掌控人的方法，使人服服贴贴，丧失独立思考，成为训服工具。你在回忆录第一章中所述你和吴铁生在四中批判家庭、划清界限、自觉革命，都属于当时的洗脑工程。我的家庭实属城市贫民，父母在农村是贫下中农，后来从河北农村逃荒到北平谋生。父亲在乡亲开的布店作伙计，布店倒闭，老板分了点布头让父亲自己去谋生。父亲自此沿街叫卖或摆摊成为小商贩。公私合营时父亲连生产工具有股本2000元。这成为四中社教时重新划分我家庭出身是小业主的根据。政治老师兼班主任与我谈话，让我对家庭要有正确认识，我虽不理解，但也只能相信组织，硬性去认识父亲有剥削性质的一面。这种认识是强逼性的，是组织上给你戴上的紧箍咒，使你绝对服从。我们这一代几乎个个都经过这类‘洗礼’，只是蒙然不知已被洗脑，丧失独立思考。现在极左思潮在普通群众中仍有广泛的影响，因此我说你的回忆录有启蒙和启示录的作用。”

笔者回信：“高峰，我同意你的分析。我要补充的是：在64、65年尚没有‘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些说法和概念。当时流行的提法是‘自觉革命’、‘改造思想’、‘划清界限’、‘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向无产阶级投

降”等等。到了66年、67年文革时期，人民日报提出并流行开了‘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等新的说法、新的概念。毛泽东对人的改造工程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些都是共产党对年轻人洗脑，进而控制思想的手段。到了1968年9月以后，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并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又有了新的提法。社会上流行“臭老九”的说法，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成了‘没有改造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思想改造’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和概念，但一以贯之的共同特点是，必须作践自己，骂自己，或骂父母，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以便重新做人，永远跟党走。此种情景非常类似宗教里所说，人要认识自身的‘原罪，不断地去‘赎罪’。而指引自己重生的教主就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党。这应是当年思想文化史（党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历史系在太平庄的半工半读，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或晚上开展史学革命，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来批判“让步政策”、“历史主义”，实为批判翦伯赞的史学理论。在一次全系的批判大会上，五年级的杨绍明（杨尚昆之子）做了长篇批判发言。系党总支部书记徐华民在台下对我们说，杨绍明写的批判文章很有水平，就像九评似的。后来听说，杨绍明的发言稿是一篇大文章，是北京市委给北大历史系下达的任务，意图是给批判《海瑞罢官》等做总结，让学术批判到此为止。同时，全系传达、学习了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文革爆发后，‘二月提纲’成了彭真对抗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到了4、5月，人人感觉到一场大风暴越逼越近了。一天同班的徐森对我说，解放军报批判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折衷主义”，这一定有所指。五一劳动节时，彭真从天安门城楼上消失了。班里开会时，我、高发元、张明华同时注意到了此事并有议论。当时报上批判三家村，点名批判了北京市三个市级领导吴晗、邓拓、廖沫沙。很多人在想：彭真可能出事了。在彭佩云召集的学生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班张明华（干部子弟）发言：“彭真反对毛主席，就打倒他！”当时彭罗陆杨被打倒一事尚未在群众中传达。那次座谈会后，彭佩云在党员教师、干部会议上，指示要注意学生张明华的动向。（这是魏杞文老师在文革初透露的。）

2，文革爆发，燕园大乱

5月下旬，曾有人来北太平庄发动群众，找少数学生开座谈会（一年级也有人参加），来人一再问：“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来人似是中宣部或中央办公厅的，名字和日期都记不清了。（这件事的内情，至今未见有人披露。）

5月底，我们世界史班到南口二七机车车辆厂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帮助工人师傅开展大批判。6月1日晚，我们在南口镇听到中央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徐森主张立刻返回太平庄历史系，大家赞同，于是6月2日马上回到太平庄。一回来，历史系的干部、教师都没影儿了，五年级的同学站在院子里演说，批判陆平，说北大党委应打倒，说历史系党总支也有问题。记得五年级有个叫王明达的同学几次到我们一年级演说，慷慨激昂。到了6月3日，系里通知全体返回校本部，参加文化大革命。

6月3日，大家打好行李，登上卡车，返回燕园，全体历史系学生暂时入住未名湖畔大体育馆。大体育馆内按不同班级布满了一排排地铺。回到北大，听到许多5月25日发生的事。第一张大字报在大饭厅东墙贴出后，一下子炸了锅，围观人极多，有支持的，有反对的，有人站在大字报前高呼“保卫校党委！”也有人高呼“打倒陆平！”两派师生辩论激烈。有人说谭天荣（注1957年北大著名右派）又跳出来了！这个大字报是反党！还有很

多人在大字报前列队宣誓保卫校党委。我听中文系马西沙（我小学、中学校友）说，他碰上文二四同学列队游行，高呼口号：“支持聂元梓大字报！打倒陆平！”他对文二四高喊：

“快去大饭厅大字报那儿！你们立头功！”（马西沙为人豪爽，好友们都戏称他为“马匪”）历史系老师魏杞文因支持大字报，招呼碰到的老师快去大饭厅看大字报，被人扭送到校党委，党委要他认错，他回答，“对修正主义党委，我没什么错可认！”第一张大字报签名人之一高云鹏在校园遭人围攻和推打。25日晚陆平党委召开党委常委会，组织反击大字报。校园各处贴满了支持与反对聂元梓的针锋相对的两种大字报。

我们6月3日返校当晚，全系学生听了5·25深夜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北大的讲话录音及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在我印象里，李雪峰没有对陆平、彭佩云及聂元梓七人大字报明确表态。但说了许多原则性的话，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等等。特别的一点是，传达了周总理的一个指示“大字报要内外有别”，我当时想可能是指涉及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要贴到外面让外国人看吧。

“内外有别”仅在6月初执行了几天，涉及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被要求贴在小食堂里面。当时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夜来北大看大字报。我在小食堂看大字报时，看到历史系世界史二年级的徐博东（干部子弟）贴的一张大字报《二月兵变》，说有人要搞军事政变，举了些捕风捉影的事。徐博东碰到我问我，看了他那张大字没有，是不是也发现了兵变迹象？我心想“胡扯！”笑笑没说什么。后来康生讲有个“二月兵变”，我就想，没准就是从这儿受到的启发。

6月1日晚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送、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此后从6月2日开始，北京市每天都有各大专院校、各中学、机关单位上万人来北大看大字报、开座谈会。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内外有别”很快失效。据统计，仅从6月1日至6日这六天，北大就贴出了近五万多份大字报。历史系三年级同学从四清一线返校后，接连贴出几份批判翦伯赞的长篇大字报。那时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鸡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按列宁的说法“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当时确实是够热闹的。过了几天，同班的张文虎告诉我，听说毛主席6月1日指示康生在中央台、人民日报广播、刊登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时，有个批示是“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用语令人震惊。后来得知，毛泽东确有此批示。（注1）

6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此社论提到北京大学1964年到1965年的社教运动，提到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对北大左派的打击、报复。于是关于北大社教和国际饭店会议的情况，便在学生中盛传。

1964年11月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盘石为首的北大社教工作队组进驻北大并动员、支持干部、教师给校党委、陆平提意见。11月29日，工作组把陆平定为“实际上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方向。”但不久邓小平、彭真都严厉批评了张盘石工作组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保了陆平，撤了张盘石工作组组长职务，换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为组长，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及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为副组长。于1965年3月29日在国际饭店开始进行，历时近半年，整以哲学系为主的那些给陆平党委提意见的北大社教积极分子，要他们做检查并对他们进行批判，甚至批斗。此即整人的“国际饭店会议”。彭真在人大大会堂小礼堂对北大工作队及北大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讲：“有的人说，不应批判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打击都打击得，为什么批判不得？”（注2）我曾向高云鹏（第一张大字报签名人之

一) 求证当时国际饭店会议的整人情况, 高说: “当时改组后的工作队想把哲学系在整风中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打成反党小集团, 然后化整为零, 分到农村去四清, 然后就不让这些人回北大, 留在农村了。”(我心想, 这不就是 57 年整风反右时的做法吗?) 高云鹏还说:

“国际饭店会议整人时, 他们会议主持人就是邓拓。到了 66 年 4、5 月报上批判“三家村”, 点了邓拓的名。他们那些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就想到, 平反、翻案的机会来了。5 月 19 日北大党委传达了《五一六通知》后, 胆子就更大了。”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有七个签名人, 都是哲学系的干部、教师。为什么都是哲学系的? 因为在北大“社教”和“国际饭店会议”中哲学系斗争最激烈。大字报签名人除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外, 有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李醒尘。七人共同点是在 64 年至 65 年的北大社教中, 都是批评陆平、校党委的积极分子, 在社教后期的国际饭店会议中都挨过整。他们在 64、65 年批评校党委, 与 57 年整风、鸣放时期的批评者相比, 使用的当然不是自由、民主之类的话语, 而是与时俱进的反修话语、兴无灭资类的词藻。与 57 年的共同之处是, 开始都是给党的领导提意见, 而后因此而挨整。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哲学系的积极分子须人人做检查, 并接受批判。但是他们顶的很厉害。文革初, 校园里流传着当时国际饭店会议上李清昆说的一句话, “杀了孙蓬一, 还有郭罗基。”同学们对他们不肯低头认错, 很佩服。觉得他们是硬汉子。

文革后, 有一种说法是康生夫人曹轶欧指使聂元梓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此说法不实。当时我身在北大, 切身感到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现是北大内部小气候和外部大气候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据笔者调查, 大字报最初的酝酿者是宋一秀、赵正义、杨克明三人。尔后聂元梓和另外三人陆续加入。赵正义、宋一秀最初是给《解放军》写篇稿, 分别起草了第一稿、第二稿。杨克明于 24 号晚把宋一秀的第二稿改写成大字报稿, 完成了第三稿。杨克明是大字报最主要的作者。聂元梓最后在 25 号上午与大家一起审稿时在结尾加了三句口号。当时中央有个学术批判调查组在北大, 组长是曹轶欧。聂元梓拿不准贴大字报的后果, 在 25 号之前曾和杨克明一起去找曹轶欧询问: “能不能给北大党委陆平贴大字报?” 曹回答“能, 只要符合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就行。”(注 3) 贴大字报的行动是六人立意在先(李醒尘是在最后一天 25 号才知道贴大字报一事并签了名), 曹轶欧支持在后。大字报内容曹不知道, 曹事先没看过底稿。聂对曹的询问其他五个人当时不知(除了杨克明之外)。聂在她的《回忆录》中说, 在大字报贴出之前, 曾把询问曹轶欧之事告知六人, 应是记忆有误, 不准确。(高云鹏亲自告诉我, 他和宋一秀在大字报贴出前肯定不知道此事, 没听聂讲过。) 此外, 贴大字报的决定是七人自己的决定, 并不是曹出的主意。但是聂向曹询问时, 曹确实表示了支持。大字报贴出后全校轰动。调查组的张恩慈找杨克明要了大字报底稿。张恩慈是前北大哲学系教员, 在社教中与聂元梓在同一阵线, 社教后调到马列主义学院工作。张恩慈把大字报底稿交给曹轶欧, 曹交给康生。

曹轶欧把大字报底稿交给康生之后, 事情下一步的发展, 按王学珍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所述: 5 月 25 日“当天, 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 送给康生。后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 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纪事》的这一叙述与坊间流行的说法一致, 但并不准确。

《纪事》主观判断“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私自向毛主席秘报, 似乎是搞阴谋。实际情形是, 5 月 25 日大字报贴出后, 5 月 27 日大字报被刊登在第 13 期《文化革命简报》上, 《简报》是《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联合编印的。(注 4) 按常规, 此《简报》不会只送毛泽东一位中央领导。《简报》是由报送中央领导的党的文宣机构上报的。康生当时已是中央文革成员, 他的行动是在党的政治纪律的规则之内。康生向毛主席反映与《五一六通知》有关的社会动态(聂等人大字报), 完全是责内之事、合法行为, 谈不上“阴谋”。历史的真正教训是, 在五月中央会议上, 当毛泽东把个人的意志强加于全

党时，竟无人抵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订的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获政治局扩大会议顺利通过，文革大动乱由此开始。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竟无一人是“男儿”。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不仅在于众多高级干部的软弱、妥协，更与高干们对君主的愚忠观念有关，更重要的原因应在无法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进行约束、监督、制衡的体制中探究。

当毛泽东在外地看到由飞机速递，送来的第13期《简报》时，已是6月1日中午。毛泽东主席阅后即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不是康生打电话给毛泽东）。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注5）毛泽东看过第13期《文化革命简报》后有个批示，是写在《简报》上的。批示是：“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请酌办。”（注6）毛亲自决定支持并向全国公布聂等人的大字报，于是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大字报并同时刊登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10年文革由此爆发。毛泽东利用“5·25大字报”，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引发了长达十年的民族大灾难。毛泽东无疑是发动文革的第一责任人。

康生、曹轶欧在第一时间支持了大字报是事实，说他们事先“指使”聂元梓则不符合事实。文革后聂元梓并未因康生被否定而把贴大字报责任推给康生，其他六人无一承认大字报是受曹轶欧、康生“指使”。

2015年4月29日，在一次北大校友聚会上，我当面就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经过，询问了大字报当事人、签名人之一高云鹏。高云鹏虽已高龄，但身体健朗，思路清晰。他说：最初是宋一秀和赵正义给解放军报社写一篇稿，主要讲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政治大革命。赵、宋分别写了第一稿、第二稿之后，高云鹏、杨克明、夏剑豸、聂元梓参加了进来。杨克明提议干脆改成大字报，大家同意。于是杨克明于24日晚起草了第三稿，把稿子改写成大字报形式。25号早6：00高云鹏到杨克明宿舍取了大字报草稿，与宋、赵、夏四人在24楼一间宿舍一句一句地进行斟酌、审定，后来聂元梓来到参加审定并在稿子最后加了三句口号。大字报定稿后由夏剑豸、高云鹏各抄成一份大字报。然后五人分别签了名，杨克明不在是由高代签。最后高去贴大字报时在楼道里碰见李醒尘，告知了他大字报内容，他表示同意。于是李醒尘也签了名。然后在25号下午2：30左右便把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东墙。从高云鹏以上所述，可知从25号这一天最后审稿、抄写和贴出大字报过程可以确定，聂元梓根本没时间向曹轶欧汇报大字报内容，因此曹是肯定不知道大字报的内容。故‘指使’一说不能成立。当时由高、夏二人各抄写了一份大字报，共两份，高的那份贴了出去，夏的那份后来寄给了中央办公厅，再后来国家图书馆到中央办公厅把大字报取走，做为文物收藏了起来。这是国图的研究员告知的笔者。

我于2015年4月17日拜访聂元梓，向她求证：第一张大字报是怎样面世的？她再三肯定“是自发的。”5月19日北大党委开会传达了《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在5月19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后，觉得北大的问题有希望得到澄清了，在社教中提意见而后在国际饭店会议挨整的人有希望平反了。于是打算给中央写信，写报告。后来与其他五人（赵、宋、杨、高、夏）商议，决定不写报告，改成写大字报。听了《五一六通知》的传达，是聂元梓等人下决心“造反”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炎黄春秋》于2010年第一期刊载了聂元梓给编辑部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与康生老婆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聂的这个说法符合实际。

以我之见，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与两件事关联最大。一是“国际饭店会议”，反映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二是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旨意。没有“国际饭店会议”或者没有“五一六通知”，缺少一样，都不会有北大的第一张“5·25”大字报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出现。这是两个决定性的因素。回顾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过程，说明文革的爆发是上层政治斗争与社会矛盾互动的结果。而不是阴谋论的产物。

3、向历史的纵深探索，追问：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

笔者回忆北大文革，常想：为什么文革首先在北大爆发？在基层，真接的背景与动因是北大社教、国际饭店会议。那么北大社教的发生又有着怎样的更深远的历史背景？这就有必要从北大社教之前更早的历史进行挖掘和追问，探索北大五十年代以来的矛盾及其发展。

据笔者文革后的深入了解，从陆平1957年到北大上任至1964年社教，一般党员干部、教师、甚至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对陆平的不满情绪，与陆平的矛盾不断积累、激化。北大群众与陆平之间的官民矛盾不断积累、强化，直至爆炸有个过程。

1957年反右时，彭真批评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右倾”，认为他反右太手软，便把陆平派到北大代替江担任北大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陆平到北大就是来纠正“右倾”。到1958年1月，陆平上任不久就搞了个“反右补课”，增划右派173人。使北大右派总数达到699人，其中学生589人。1959年北大反右倾机会主义，也是搞扩大化。按规定反右倾机会主义在13级以上干部中开展。而北大却扩大到了13级以下。当时教员郭罗基就遭到批判。按北大老人们的说法，“陆平逼死了邹鲁风。”1958年邹鲁风任人民大学副校长，按上级指示人大、北大组织了对人民公社的调查，由邹鲁风负责。1959年邹鲁风调到北大任副校长，仍负责北大、人大联合调查组，调查河南省、河北省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调查组整理的材料真实地反映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反右倾运动一来，调查组整理的材料被批判是“反对三面红旗”、“猖狂攻击人民公社。”陆平把责任全部推给邹鲁风，主持党委会批判邹鲁风，调查组人员也挨了批判。1959年10月25日晚，陆平到邹宅与邹长谈，要邹认真认识错误。邹第2日（26日夜）自杀身亡。邹鲁风死后，陆平批邹是“叛徒”，把邹开除了党籍。当年邹鲁风在师生中广受好评，对他的去世，师生们十分惋惜。以上即北大老人们广为流传的“陆平赶走了江隆基，逼死了邹鲁风。”紧接着，陆平打倒了马寅初。1958年、1959年毛泽东在中央几次点名批判了马寅初，1959年11月时陆平在康生指示下，在全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民主人士、老校长马寅初“人口论”的运动。当时许多干部、教师反对批马，陆平答复“非批不可。”结果，马被批下了台。1960年3月28日马寅初被国务院免去北大校长的职名，而后陆平取而代之兼任了校长。

我的北大历史系学长、62届毕业生王曾喻，在《北大五年》（刊于《北京大学新闻网》）一文中，详述了陆平领导北大期间，57年反右，58年“拔白旗”，59年反右倾，再后的批马寅初，61、62年教育改革中本人的经历与感受。他感到：他在北大的五年（57年至62年）是“多灾多难”的时期，“在校期间正值北大的民主和科学传统被摧残最烈的时期。”并说“我们这个阶段的北大人，谈及陆平，极有恶感。”并感叹陆平终于“难逃文革一劫。”

我看到一份有关北大副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的史料。周培源于1965年7月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与周恩来总理相处时，在飞机上总理问他北大的情况，周培源说北大很复杂，要写个材料交总理。他后来转交给总理一封信。状告陆平在北大“乱干”，把北大搞得很乱。北大社教后期，万里找周培源谈话，要他改变对陆平看法，周培源不接受。5、25大字报贴出后，周培源在现场看了大字报后回家，对夫人、孩子说：“我向总理告状，告的就是大字报上的三个人。”（注7）

我们历史系干部吴维能的经历也很有典型意义。他出身小八路，历史系没毕业就留校当了干部。，57年时任系团总支书记、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他应属于陆平体制内的培养对象。1959年因家乡有人饿死，父亲告诉他“没饭吃”，他讲了出去，为此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到食堂干活。文革一爆发，吴维能马上造反，翻身成了陆平体制对立面，成为历史系文革主任、校文革成员。1968年工宣队进校后，追查他1959年右倾机会主义问题，他被迫于1968年11月4日在圆明园喝了DDV后投湖自尽，终没逃过陆平1959年定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劫难。

文革后，郭罗基给自己定位是中共的“党内反对派”，表示他在北大从57年到59年到64年社教到文革爆发，一直是北大中共陆平党的反对派。虽然不同时期反体制的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但他反专治的立场一直没变。据美国《北京之春》记者亚衣对郭罗基的采访，郭回顾了他在文革前的北大经历，他说道：他因“右倾”，在“57、58、59年都受过批判”。他在“1957年从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转向共产党的反对派，从此陷入厄运”。“从1962年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郭说“1965年，我和北大哲学系一些人被发配到农村，党委书记陆平对我们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当时已作好思想准备在农村消磨一生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改变了命运”（注8）。郭罗基在1957、1959年都曾因右倾言论受过批判，也做过检讨。从1962起他决心不再向党领导做任何检讨（注9）。在1965年的“国际饭店会议”上，他和孙蓬一顶的最厉害。从郭罗基由1957年到文革前夕的北大经历，研究北大的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整人和反整人的历史。正如郭罗基对我所说：“我的头上长期戴着‘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在当时，没有比这更大的帽子了。我确实反对‘三面红旗’，自信是正确的，不是错误，更不是罪行。我拒不检讨，但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如果辩护，正好坐实他们所说的罪错。所以，我叫得响的就是反对整人。”

陆平领导北大期间，政治运动不断，整了很多。历史的规律从来就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到了64、65年，北大民众对官僚的反抗，只会攻其“右倾”，不会攻其“极左”，否则就会政治不正确，反抗者自身难保。这样曲线反抗，对大多数人来讲是不自觉的。他们在潜意识的推动下，因不满而起来反抗。但也有个别例外，如57年哲学系被划为右派的王雨田、金志广，在文革中便趁机造反，在北大贴出大字报说“我不是右派”，要求平反，要求正义，要求人权。

2010年7月在《领导者》第34期，刊载了韩三洲的《“说实话的时间不多了”——90岁的聂元梓想些什么？》一文。聂元梓对采访她的韩三洲讲：“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这是聂元梓做为文革的第一批造反者，在其晚年，回顾了从1957年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北大历史后，所道出的心中“实话”。

应指出的是，聂元梓等哲学系左派，在文革之初首批造反，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是紧跟毛泽东的旨意，从左倾的立场出发，以左倾的意识形态为武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下，批判修正主义，反陆平党委。从1957年反右到1966年“5·25”大字报，北大的形势是越来越左，直至文革爆发。

我曾向郭罗基老师求教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叶至文革爆发这段时间，对北大政治史的看法。郭给我回电邮指出：“文革前，北大的历史就是不断‘翻烙饼’。从57年开始到社教以前，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陆平党委积怨甚多。社教是工作队发动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争相出气，翻了一次烙饼。社教后期的反攻倒算，又是领导整群众、上面整下面，整得更狠，烙饼又翻过来了。文革是烙饼再翻一次，群众整领导、下面整上面，整得更上加狠。在左倾的潮流下，要整人，不论是上面整下面还是下面整上面，都必须抓对方的‘右’。这样，自己就在‘左’的台阶上进入更高的一级。文革是在‘左’的台阶上达到极点，才能物极必反，非如此左倾路线不会破产。”

4、对文革之初的记忆

1966年6月4日，魏杞文老师来到历史系学生住的体育馆，立刻被全系学生团团围住，魏说：“同学们要敢于革命，善于革命，但首先要敢于革命！”大家掌声雷动。6月上旬，班、级、科、系的建制尚未打破。学校的正常建制是到8月中旬，在工作组撤走、大串连开始后逐渐解体的。我们在6月中搬回38楼前，全系活动都在大体育馆内，体育馆内外贴满了大字报。高年级学生中贴出不少揪“修正主义苗子”，批判陆平社会基础（班里团支部书记）的大字报。我感到高年级学生间多年的磨擦、恩怨都爆发了出来，又好像是大火先从下面烧，从下往上烧。大体育馆内充满高年级学生之间乱斗的景象。我当时认为这种乱斗现象不妥，便在班里开会时提出应矛头向上，掌握斗争大方向，批黑邦，学生间不应彼此混战、乱斗。大家同意，我便起草了题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大字报，贴在了体育馆外墙。魏杞文老师看后，认为挺好，加签了他的名字。但大字报反响不大。这时工作组已进校，并没制止这股乱斗风。

5、北大第一个自杀的人：历史系教授汪篪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敢闯敢干，迎接革命风浪的考验，做坚定的革命派，绝不做观潮派，更不能做落后分子。

6月7日前后，在大体育馆和历史系所在地三院，有许多批判汪篪教授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揭发汪篪在1959年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还是以班为单位活动。班里开会时，干部子弟张某说，别的班在批判中国古代史教授汪篪，他是1959年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咱们班在这场斗争中不能落后。班长、团支书都表示赞同，主张我们班要有所行动。有人提议去汪家里批斗，全班同学表态同意，无一反对。于是大约在6月8日，全班去了汪篪家里，汪说有病，躺在床上。大家喊了口号，其中一句口号是“汪篪必须老实交待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行！”喊完口号就离开了，批斗会前后大约十分钟左右。后来听说，不知那个班的同学在汪篪家门上贴了封条，汪出门不方便就把封条撕了下来（还有一说法是被风刮下来的）。第二天有外班学生看见封条撕破在地上，便指汪“仇视文革，故意捣乱。”并告到历史系工作组。历史系工作组是从海军和中央各部委调来的。6月10日，工作组找到汪，要汪认错并把封条复原贴回门上。汪照做了。但他内心无法忍受此一屈辱，当晚吞服了大量“敌敌畏”，于1966年6月11日晨气绝身亡。这是文革中北大第一个自杀的案子。

汪篋（三级教授）于文革前，在历史系被称为又红又专的马列主义史学家。半工半读时，我曾听系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对我们学生说过，汪教授是马列主义史学专家，系里要让他把学术成果整理出来，保存下来。汪篋教授过我们秦汉史，我最爱听他的课。他讲课不按讲义，而是天马行空，妙趣横生。他对秦始皇的评价很高，对“焚书坑儒”、“尊法反儒”持肯定观点，认为是巩固了新兴封建阶级的统治。汪认为汉初刘邦也是“尊法反儒”，他在课堂上举例子说，有大儒求见刘邦，刘邦很讨厌他们，于是夺其冠，把他们戴的高帽子摘下来，往里撒尿。汪还做了一个往帽子里撒尿的动作，逗的同学大笑。当时对中国古代的儒法之争还不像六、七年之后批林批孔时那样，被梁效宣扬的全民皆知并把儒法之争的史论推至极端。当年听汪的讲授觉得很新鲜、有深度。文革中看到印发的毛泽东没发表的讲话中有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讲：秦始皇“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民主人士们，“你骂我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不知汪篋是否知道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但文革一开始，他就被现代秦始皇给坑掉了。汪篋教授去世后，工作组一位从海军来的工作组成员曾到我们班询问去汪篋家里开批斗会的情况，并说，坏人死了就死了，没事。汪被工作组定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

很多年后，我才了解到，汪篋是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弟子。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曾被史学界认为是马列主义新史学的带头人。自1958年郭沫若公开点名批判陈寅恪后，汪做为陈的弟子的地位也一落千丈，并于1959年遭到批判，此后心情郁闷，身体一下垮了下来，体重掉了50多公斤，由大胖子变得干瘦，整个人变了形。这应是他文革之初自杀的远因，事非偶然。最后工作组命令复原封条的事件，成了最后的夺命导火索。尽管如此，我们全班同学到汪老师家开批斗会，不能说对他的自杀没有任何责任。我非常悔恨当年自己对汪老师的大不敬。这实在是罪过。此事令同学们追悔不已。汪篋老师：太对不起了！学生诚心诚意道歉！

注释：

注1：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毛泽东1966年6月1日批示。

注2：《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05页（第六章第4节）。

注3：《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2005年1月版133页（第八章第3节）。

注4：《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第五卷第589页。

注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注6：同注1。

注7：薄亚达：《十年风焰漫燕园》刊于《华夏文摘》增刊第762期2010年8月10日。

注8：亚衣：《访哈佛大学法学院高级研究员郭罗基》刊于《北京之春》杂志1998年9月号。

（第二章未完待续）

□ 原载王复兴：《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